

汉英同传中删减与增译现象的案例分

张其帆 香港理工大学

摘要: 本文以Gile (2009) 的认知负荷模型和释意学派口译理论作为理论框架, 以源语和译文间距(EVS)作为测量工具, 分析王岐山副总理发言的英语同传中的删减与增译现象。该案例中所涉及的删减现象分为完全省略和归纳省略两类, 其主要目的为配合目标语语言习惯和减低认知负荷两类。增译的类别则包括显化、脱壳、补充三类, 其主要目的为配合目标语语言习惯。

关键词: 汉英同传; 删减; 增译; EVS间距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73X (2011) 06-0042-05

1. 同传中的省略

同传中的省略大致分为策略性省略和制约性省略, 其在译文中的表现形式均为某部分源语在译文中被省略。根据释意学派口译理论, 策略性省略的原因包括语言习惯不同或文化差异, 若每字每句直译, 易使听众产生理解困难 (Seleskovitch & Lederer, 1995:115), 因此口译必须经过脱离源语语言外壳 (deverbalization) 的处理过程 (同上:24)。脱离源语语言外壳 (简称脱壳) 是指译员理解源语意义后, 保留所听到的整体内容但摆脱源语语言形式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译员经过判断后省略源语某些部分并用地道的目标语表达讲者的意思。所省略的主要是无法或不必要在译文中显示的部分, 其动机主要是便于听众理解。

认知心理口译理论认为, 同传的工作记忆在处理过大的认知负荷 (cognitive load) 时无法同步兼顾听和说, 译员遂启动过滤机制 (filtering mechanism), 从而引起制约性省略。认知心理口译理论则认为译员会采取策略性省略以克服认知负荷增加后引发的制约性省略。刘敏华的研究发现, 专家口译员和口译学生最大的差异之一就是前者懂得筛选核心信息 (Liu, 2001: 90), 避免受到枝节信息的影响。自然语言 (spontaneous speech) 中常出现重复、犹豫、停顿等现象, 而这类现象在人类短期记忆中的停留十分短促 (Clark & Clark, 1977:138), 为了应付同传的时间压力, 译员可能在无意识下省略这些口语现象。一言以蔽之, 省略的发生可能是译员受到不同因素所制约而造成无可奈何的漏译, 或是出于权衡轻重后的策略性决策。

2. 同传中的增译

与省略相对的是增译。之所以需要增译, 是由于源语和目标语之间存有文化和语言结构的不同。该现象在同传译文中极为常见 (Donato, 2003), 译员适时增译, 在译文中附上额外信息, 旨在帮助听众理解 (Kalina, 1998)。

语言种类相异也是译文需要作增译的一个原因。中文“句子内部的连接或句子间的连接采用语义手段” (方梦之, 2004), 连词的使用相对少。英文句子内部的连接或句子间的连接采用句法手段或词汇手段, 连词的使用较中文多。正如胡开

宝和陶庆 (2009) 在其语料库分析中发现, 译员往往在英语译文中加上连接词以明示汉语原文语句之间的隐含关系。换言之, 中译英时需在译文中加上“润滑剂” (仲伟合、詹成, 2009: 207) 以使译文流畅自然。

显化增译与补充增译在译文中的呈现形式一致, 即译文中出现某些源语中没有的字词。但两者之间也存在差异, 即增加的部分在源语中的属性不同 (张其帆, 2009)。若所增加的内容在源语中为暗示 (implied) 部分, 则属于显化增译; 若在源语中并非属于暗示的部分, 则属于补充增译。 (Mossop, 2010: 105)

3. 理论框架

应用 Gile (2009) 的认知负荷模型 (Efforts Model), 实证研究的结果说明某些情况下译员的表现会受到影响, 这类影响因素包括源语的生僻用字 (de Groot, 1997)、复杂句子结构 (Daro, Fabbro & Lambert, 1996)、非母语语音语调 (Kurz, 2008) 等。认知负荷模型认为, 同传包含聆听、产出、记忆、协调四个处理目标, 口译过程中出现问题是由于某一项处理目标消耗了译员过多的认知资源。支持该解释成立的一个关键根据是 Gile (1999) 所提出的“走钢丝假设” (Tightrope Hypothesis)。Gile 将同传译员比作走钢丝的杂技演员, 只有不断取得平衡方可完成任务。同传过程中译员必须把有限的认知资源恰当地分配到前述的四个处理目标上, 对其中任何一项处理目标的消耗量增加便意味着其他处理目标所获得的认知资源相应减少。译员必须不断平衡调配认知资源, 以防错漏的发生。对于漏译现象, 可从认知负荷模型和认知资源受到局限的角度, 试加以解释。例如讲者语速太快, 译员必须聚精会神听第一句同时将其口译成目标语, 此时剩下可供译员聆听并口译第二句的认知资源就相应缩减, 如此则下一句的译文往往容易发生错漏。

教学层面上, 认知负荷模型和走钢丝假设是很理想的工具 (Gile, 2009: 158), 能够帮助学生分析导致译文产生错漏的原因。但这两项工具却无法解释策略性省略部分的原因为何, 因为两者都“并不考虑语境因素, 而根据译文必须尽量零遗漏的假设”为基础 (Pym, 2008:84) 将省略和漏译相提并论。

但译文零遗漏只是理想情况而已,不少实证研究发现,专家译员的译文中也常有省略现象(Shlesinger, 1999; Liu, 2001)。此时,释意学派口译理论的“脱壳”概念就能派上用场。认知理论与释意学派理论各有长短,可以互补。Alonso Bacigalup (2006) 与 Ito-Bererot (2006) 的博士论文的理论框架便是将认知负荷模型与释意学派口译理论两相结合。

脱壳在口译过程中是一种自然现象(Lederer, 2007:25),是指译员摆脱源语字词的外壳,用自然且不受源语干扰的方式以目标语表达(Seleskovitch & Lederer, 1995:118)。记忆是脱壳过程中的关键步骤(许明, 2010),心理学家发现人类记忆所能保留的内容并非词语或句型等语言外壳,而是经过理解后的意群(Clark & Clark, 1977:137)。同传进行期间,源语经译员理解加工后成为其短期记忆中的意群,经过理解后的意群往往与源语之间存有语言外壳的差异。译员再根据目标语的语言习惯翻译意群,因此译文中普遍存有增删现象。

然而,目前没有任何研究工具能客观判断增删现象成因属于策略运用或认知局限(Tommola & Lindholm, 1995)。有声思维法(Think aloud Protocol - TAP)是让研究对象在执行某项任务的过程中,同时口述本身的思维与判断的方法。TAP虽然在翻译研究中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但其效度和信度却受到质疑(Göpferic & Jääskeläinen, 2009)。此外,传统的TAP难以应用在口译研究中,因为口译员无法在进行口译期间同时口述本身的思考和判断。折衷的办法是采用事后回想式(retrospective) TAP。Gumul (2006) 利用事后回想式 TAP 试图了解同传增删的成因,但实验对象回想时却未提及或解释原因。增译和省略或由译员的潜意识所主导(2006: 184),因此参与研究的译员难以回想到口译期间增译或省略的原因。此外,译员在点评时所给出的解释可能比较主观,因此事后回想式 TAP 对口译研究而言只能算是数据收集手段。

源语和译文之间的间距称为 Ear Voice Span (EVS),此间距能被客观测量,因而可客观描述删减或增译的发生同源语和译文间距的关系。译员能利用 EVS 消化源语内容、规划口译内容、继续聆听源语,也能随时根据需要调整 EVS (Pio, 2003),因此 EVS 可被视为译员所需的最起码语段处理时间(Lee, 2006:209)。本文应用 EVS 表征,量度源语和译文距离,结合 Gile 模型和释意学派口译理论框架,探讨源语与译文间距同增删现象之间的关系。

4. 研究案例

分析案例为王岐山副总理于 2009 年 7 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结束后,在 28 日出席美中商会和国家委员会美中关系晚宴上发表讲话时的英语同传。根据录像、发言内容与速度观察,讲者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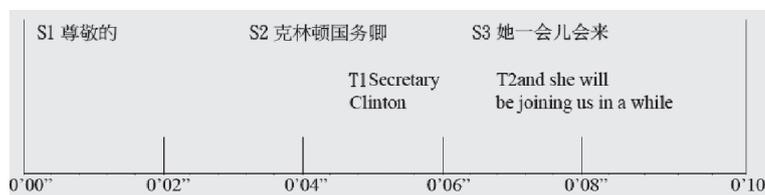
时并非读稿,这就要求译员必须随机应变。该译文较能表现出同传特征,并较具有口译分析和参考价值。本项研究的程序是:1) 将源语和译文逐字不漏听写;2) 按照语段的时间顺序将听写稿排列在刻度表上;3) 对源语(S)和目标语(T)进行逐句比较;4) 将省略和增译现象分类。源语全长 16' 01",译文在第 0' 05"开始,16' 03"结束。

5. 分析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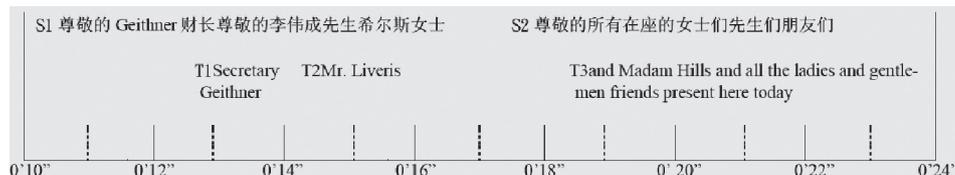
5.1 完全省略

第一类删减为完全省略,即同样的语段部分在译文中被完全省去且一以贯之,这主要为了使译文配合发言场合的语境并兼顾译文语言习惯。如节录一和二所示:

节录一



节录二



演讲开始时讲者逐一向在座的美方代表致意,尊称他们为“尊敬的某某”,这部分寒暄语在同传中却被省略。节录一中“尊敬的”被省略的原因难以判断,可能是由于演讲刚开始,信号或耳机出现技术问题。但节录二的目标语中所有“尊敬的”也被省略,也就是说所有“尊敬的”在目标语中毫无例外地被省略。因此,这一省略可被视为译员在本次同传语境中的一贯行为。从 EVS 的角度分析,节录一 S1 的“尊敬的”和 T1 的 Secretary Clinton 之间有约三秒的 EVS;节录二 S1 的“尊敬的……”和 T1 的 Secretary Geithner 之间也有约两秒的 EVS,可见译员并非因为负荷增加而省略“尊敬的”。因此节录一和二中的省略可归类为有意识的完全省略,其目的是出于配合目标语语言习惯的需要。

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在外交场合尤其重视礼貌性措词,因此王副总理的致词在美方代表的姓名前均加上尊称,但对外翻译时须做到“真正是根据外国人的特点量体裁衣”(黄友义, 2000: 14)。晚宴中美方发言开始时也向中方代表致意,其在姓名之前并未加上如 the distinguished 等尊称。如基辛格发言时说:“Madam Secretary, Vice Premier Qishan Wang, State Councilor Bingguo Dai, it is an honor...”如此称呼并不代表美方不够礼貌,相反,此举是为了配合晚宴较为轻松的气氛。同传译成英语时略去汉语中的四个“尊敬的”,也是为了

配合发言时的语境和目标语的语言习惯，由此可见同传并非逐字逐句的语言转换而已。

5.2 归纳省略

第二类省略现象出现在源语和译文重叠使EVS延长时，如节录三所示。

若以停顿点划分，节录三的译文内有5个小节(T1到T5)，源语则有4个小节，其中S1、S2、S3之间的停顿较短。同传T1在S1的中段开始，一直进行到S3中段，因此S2、S3与译文T1重叠。结果S2和T2之间的EVS约有8秒，S3与其所对应的T4之间的EVS约9秒。因为S2和S3与其对应译文之间的EVS扩大，所以该两小节的内容在译文中受到压缩。对于因双语重叠增扩EVS后的省略现象可有不同解释。首先，源语和译文的重叠加上扩大后的EVS使译员负荷增加，从而影响源语接收或译文处理，造成省略。其二，译员可能为了缩短后续段落的EVS以避免更多删减而采取归纳省略。的确，T4在进行到一半时，S4便开始了。通常情况下译员无法预测讲者语段的长短，遂将S2和S3的内容进行归纳式处理，成为“but for us it was quite boring”。这种简单译法可达到两个目的：既让听众明白讲者所指的是以前坐船的情况，亦便于译员立即翻译T5，从而避免更多删减。结果S4和T5间的EVS缩短为3秒左右，因此译文相对完整。节录三显示因源语和译文重叠而增扩的EVS可能会加重译员认知负荷而产生删减；但同时也显示，若译员认知的资源受到压缩，采取归纳省略则可避免更多删减。

5.3 显化增译

显化增译是指，某些意义在源语中的方式表达相对隐约，但经译员显化增译后的表达则相对明显。一般而言，经过显化增译后的译文有助于听众理解。但显化增译却会增加译员的认知资源负担，译员必须等理解源语里的弦外之音后才可进行口译，但讲者却不会因译员的需要而停顿，因此译员必须反应敏捷。如节录四所示。

讲者在节录四中讲述他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把两国关系的发展比喻为历史的潮流，顺者昌、逆者亡，并以S5作为小结，勉励在座来宾继续顺着历史大潮流前进。S5的表达精练，未言“大家应该如何如何”，T4却增加了we should，把源语语段中相对隐约的意思显化。T4加上主语we后合乎目标语语法，而选用should则只表达勉励之意，不卑不亢恰到好处。译员之所以达成这一良好效果

果，一个条件是T3和T4的间距约有4秒，S5和T4之间的EVS约有两秒，译员并非听到源语后即刻口译，而是在语段结束后稍作停顿才开始，译员停顿能让听众消化译文内容。此外S5是重要总结，译员善用EVS规划译文并显化内容，从而把讲者的意思完整地表达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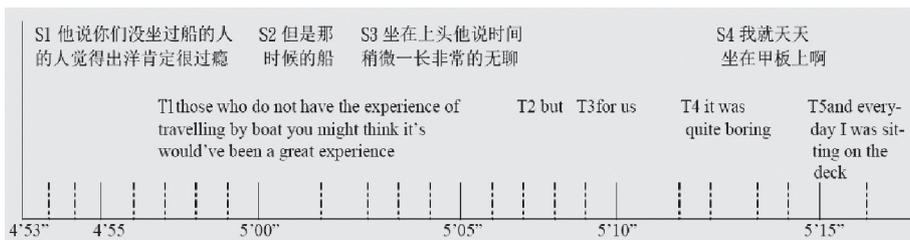
5.4 脱壳增译

脱壳增译指是译员摆脱源语的文字束缚，以增译的方式译出源语的含意。如节录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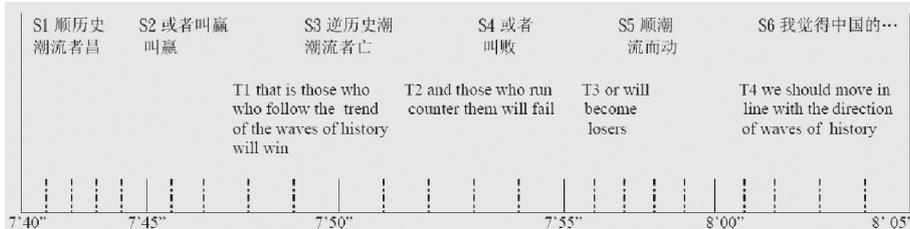
节录五中副总理谈到80年代，现任美国财长的父亲时任福特基金会驻华代表的往事。讲者说当时跟“他[财长的]父亲去申请资金”，这句话不可直译为to apply funding from his father。因为资助并非向个人或代表提出，而是向基金会提出。译员把这句话理解为“向财长的父亲查询申请资助事宜”，从而摆脱原文的语言外壳，在T2中增译talked with。此外，S4里的“做”研究项目，并非直接译成to do或to conduct，因为基金会所提供的资金只能资助研究，不能执行研究。译员口译成英语时必须脱离源语外壳后译出字面后的含意，因此S4的“做”在T2中译成to support。最后，译者在research program前加上了my，这是因为中文语境已提供研究项目归属的线索，而英译时则需要增译，这属于显化增译。T2中兼备了显化和脱壳增译。

能做到脱壳增译，译员须先听懂讲者的意思，所以要保持一定的EVS，节录五S1和T1的EVS约3秒。S1里的“他父亲”并没有在T1中出现，因为译员需要清楚“父亲”在语段里的角色才能翻译。S2有口误，所以讲者在S3重复内容，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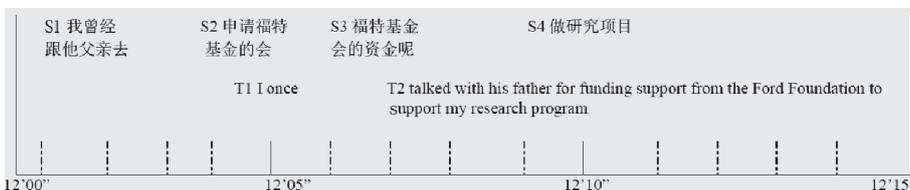
节录三



节录四



节录五



能为译员提供额外思考的时间。译员尽量延长 EVS, 一方面能对源语的理解, 另一方面也可以做好翻译的规划, 最后恰如其分地进行口译。虽然 S4 和 T2 重叠, 但因为 S4 在 T2 的中段结束, 重叠幅度相对小, 消耗在听的认知资源相对少, 说和译方面则能得到相对多的资源, 这为 T2 的脱壳和显化增译提供了便利条件。

5.5 补充增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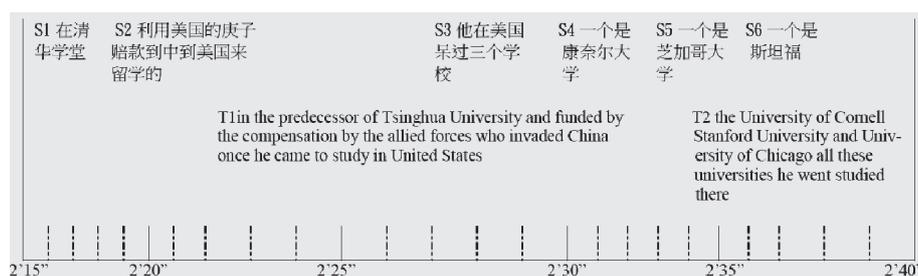
补充增译是指源语没有某些内容, 而为使听众清楚理解讲者的意思在译文中增加这部分内容的方法。例如对于源语听众熟悉但目标语听众陌生的内容, 译员必须增补额外资料以帮助听众理解。但在同传的时间压力下, 译员若要增补内容, 其认知负荷也会增加而导致内容的删减, 因此译员需要权衡轻重。如节录六。

除了极少数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外国专家外, 大部分在座的美国宾客可能对清华学堂和庚子赔款感到十分陌生。处理这类与中国历史相关的专有名词时, 最省时省力的做法是音译带过。但音译对不熟悉中国历史的外国人而言, 听到的只是无意义的噪音。S1 与 T1 的 EVS 约 5 秒, 中间没有重叠, T1 在 S2 快结束时开始, 重叠的部分约有 1 秒。译员应在理解 S1 和 S2 的核心内容后开始口译, 这样才能对 T1 进行加工处理。清华大学是国际名校, 把清华学堂译成清华大学的前身 (predecessor of Tsinghua University), 对听众而言能产生联想效果。口译庚子赔款时则须考虑同传时间压力和翻译效果两方面因素, “庚子”若音译成英语, 既消耗译员认知资源也对听众理解毫无帮助, 译员遂索性略过“庚子”二字。译员利用由省略“庚子”后而节省的认知资源在译文中增译了 the compensation by the allied forces who invaded China (入侵中国的联军所做的赔款), 此额外信息反而能为听众补充相关背景资料, 可见同传虽有时间压力, 但为便利听众理解, 译员会做适当增译。

6. 结论

同传译员所承受的时间压力极大, 尤其在汉译英(外)时, 一般认为译员聆听母语时毫无障碍, 便希望将所听到的一切内容尽早译出, 但本文发现该案例中的译员并非如此, 而是在源语和目标语间保持一段 EVS。EVS 的存在意味着译员必须经过不同步骤的处理后才能产出译文, 因此译文和原文之间应有所差异。本文根据 EVS 量度原文与译文间距, 结合 Gile (2009) 的认知负荷模型和释意派口译理论作为理论框架来分析同传案例中的增删现象。案例中删减的情况分为完全删除和归纳省略, 其主要目的是为配合目标语语言习惯或减低认知负荷。增译的类别则包括显化、脱壳、补充三类, 其主要目的是为配合目标语语言习惯。译员须充分掌握源语和目标语, 透彻理解发言内

节录六



容, 方可恰到好处地实现各类增删。同时, 译员更要意识到同传目的在于促进跨文化交际, 因此仅仅做到逐字或字面翻译是不够的, 必须考虑到语言和文化差异, 在译文中做相应的增删处理。

此外, 译员还需要保持同步性, 不能因增译而过分滞后, 并最终导致错漏的发生。本案例中的 EVS 随着源语信息密集程度及增删的需求而改变, 因此 EVS 在一篇同传中长短不一。该现象说明同传过程中译员具备灵活调控的能力, 也须除了聆听讲者外同时进行自我监听, 根据实际需要随时调整 EVS。尽管单靠 EVS 无法判断译文中增删现象的成因, 这一测量工具却能相对客观描述源语和译文的间距。本文在此基础上结合 Gile 的模型和释意学派口译理论, 对汉英同传增删现象和认知负荷的关系提供案例说明。

参 考 文 献

- [1] 方梦之. 译学词典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 [2] 黄友义. 把好编辑和翻译两道关不断提高外宣品的质量 (一) [J]. 对外大传播, 2000 (1).
- [3] 胡开宝, 陶庆汉. 英会议口译中语篇意义显化及其动因研究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9(4).
- [4] 许明. 口译认知过程中“deverbalization”的认知诠释 [J]. 中国翻译, 2010(3).
- [5] 张其帆. 中英交替传译之显化现象 [J]. 中国翻译, 2009(5).
- [6] 仲伟合, 詹成. 同声传译 [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 [7] Alonso Bacigalupe, L. *Hacia un Nuevo modelo de procesamiento de la información en interpretación simultánea: resultados de un estudio experimental* [M].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amento de Traducción, Universidade de Vigo, 2006.
- [8] Clark, H. & Clark, E. *Psychology and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Psycholinguistics* [M].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1977.
- [9] Daro, V., Fabbro, F., Lamber, S.. Conscious monitoring of attention during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J]. *Interpreting*. 1996 (1): 101-124.
- [10] de Groot, A.M.B.. Comprehension during interpreting: What do interpreters know that bilinguals don't? [A]. In S. Lambert & B. Moser-Mercer (eds.). *Bridging the Gap: Empirical Research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7: 155-190.
- [11] Gile, D.. Testing the Effort Models' tightrope hypothesis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 a contribution [J]. *Hermes* 23, 1999: 153-172.
- [12] Gile, D.. *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 Revised Edition*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2009.
- [13] Göpferic, S. & Jääskeläinen, R.. Process research into the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翻译述评”的撰写模式研究

陈琳 章艳 同济大学

摘要: 本文探讨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翻译述评”的撰写模式,阐述了该模式的概念、常规性方式、方法和规则,并展示了具体的写作案例。该模式建立在培养翻译能力的教学理念以及翻译能力的内涵和核心要素基础上,并借鉴、吸收了国内外高层次翻译专业硕士学位毕业论文的写作方案。该模式属于应用性翻译研究。主体框架由翻译和对该翻译的反思组成。

关键词: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翻译能力; 撰写模式; 翻译述评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73X (2011) 06-0046-04

导言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的培养单位已达158所院校。目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建立学位论文的具体撰写模式、明确评审标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提出了论文的三种基本方式,但师生对具体写作方案和评审标准并不清楚。MTI的培养目标和方式决定了其学位论文选题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涵盖翻译文本、项目、实验、技术、管理、岗位、流程或心理等主题,与这些选题对应的写作方案也有待加以区别。有

相当一部分论文还沿袭学术型学位论文的形式,质量往往差强人意。这是因为上述这些选题是典型的应用性研究,与学术性论文的基础性研究范式存在性质上的差异。而且MTI的课程设置不是研究性的而是实践性的,学生缺乏相应的学术理论背景和训练;同时,字数要求的降低似乎也给了学生一种错觉,认为MTI的研究论文的深度可以低于MA的研究论文。

当然,学界已经对此展开了一定的研究和摸索。早在申报学位设置时期,仲伟合(2006)认为MTI毕业论文是“考核其综合运用所学理论解

-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where are we, and where do we need to go? [J].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2009(2): 169-191.
- [14] Gumul, E.. Explication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a strategy or a by-product of language mediation? [J]. *Across Language and Cultures*, 2006(2): 171-190.
- [15] Donato, V.. Strategies adopted by student interpreters in SI: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English-Italian and the German-Italian language-pairs[J]. *The Interpreters' Newsletter*, 2003 (12): 101-134.
- [16] Ito-Bergerot, H.. Le processus cognitive de la comprehension en interpretation consecutive: acquisition des competences chez les étudiants de la section japonaise [Z].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ESIT, Université de la Sorbonne Nouvelle - Paris 3. 2006.
- [17] Kalina, S.. *Strategische Prozesse beim Dolmetschen: Theoretische Grundlagen, empirische Fallstudien, didaktische Konsequenzen* [M]. Tübingen: Gunter Narr.
- [18] Kurz, I.. The impact of non-native English on students' interpreting performance [A]. In G. Hansen, A. Chesterman, H. Gerzymisch-Arbogast (eds.). 2008: 179-192.
- [19] Pym, A.. On omission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In Hansen, G. Chesterman, A., Gerzymisch-Arbogast, H. (eds.). 2008:83-105.
- [20] Seleskovitch, D. & Lederer, M..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Teaching Interpretation*. The Registry of Interpreters for the Deaf., 1995.
- [21] Shlesinger, M.. Norms, strategies and constraints: How do we tell them apart? [A]. In A. Alvarez Lugris & A. Fernandez Ocampo (eds.) *Anovar/Anosar estudios de traducción e interpretación*. Vol. 1. Vigo: Universidade de Vigo, 1999: 65-77.
- [22] Tommola, J., & Lindholm, J..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interpreting: Which dependent variable? [A]. In J. Tommola (ed.). *Topics in Interpreting Research* [C]. Turku, Finland: University of Turku, 1995.
- [23] Lederer, M.. Can theory help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trainers and trainees? [J].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 2007 (1): 15-35.
- [24] Mossop, B.. Translating what might have been written [A]. In M. Baker, M. Olohan, M. Perez (eds.). *Text and Context: Essays o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in Honour of Ian Mason* [C]. Manchester: St. Jerome, 2010.
- [25] Pio, S.. The relation between ST delivery rate and quality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J]. *The Interpreters' Newsletter*, 2003: 69-100.
- [26] Lee, T.. A comparison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and delayed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from English into Korean [J]. *Meta*, 2006(2): 202-241.
- [作者简介]张其帆,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助理教授, 博士, AIIC成员。研究方向: 会议、法庭、社区口译, 口译教学, 口译质量评估。
[作者电子信箱]ctandrew@inet.polyu.edu.hk

English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Xueheng* School and a Distorted View of Literary Translations in Post-May Fourth China

by Wang Xueming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p. 27

Abstract: Drawing on modern especially postmodern historiography, this paper takes a close look at historical account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modern China, and calls attention to the unjustified neglect of the translations by the *Xueheng* (The Critical Review) School. Even a brief examination of the translations published in the magazine *Xueheng* would show a vastly different picture of the May Fourth translation boom. That *Xueheng* School's contributions to literary translation should stay marginalized offers theoretical insights into the way histor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written, and the way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practice is represented as well.

Key words: translation; historiography; China; the *Xueheng* school

Zhou Zuoren's Early Attempts at Fiction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Modeled Fiction Writing

by Fang Kairui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China) p.32

Abstract: During the third or the bells-lettres phase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translation in China, the celebrated 20th-century author Zhou Zuoren made visible attempts at fiction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modeled fiction writing. This paper offers a close examination of Zhou's both attempts throughout this period in reference to such contextual factors as the social conditions and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publishing. The study shows that belles-lettres translation in the fullest sense could by no means be expected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Key words: fiction translation; translation-modeled fiction writing; belles-lettres translation

Interpreters' "Neutrality" as a Problematic Concept

by Ren We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p.36

Abstract: The ethical code laid down by most interpreters' associations dictates that interpreters always be neutral, impartial, detached and objective when providing professional services. The real-life interpreting events, however, often present a different picture. Proceeding from what Wadensjö defines as the two parameters of the interpreter's neutrality, this paper problematizes the notion of interpretive neutrality by showing that because of the situation in which interpreting takes place, interpreters are scarcely able to truly remain impartial in the way they position themselves vis-à-vis different parties.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consistently maintained neutrality in interpreters' behavior.

Key words: interpreter; neutrality; partiality

Omissions and Additions in Chinese into English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a Case Study

by Cheung Kay-fan Andrew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p.42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case study of omissions and additions found in Chinese into English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These instances are mapped to the EVS and analyzed according to Gile's Efforts Model and the interpretive theory of translation. Instances of omiss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ose that may be triggered by the need to accommodate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those that may be triggered by interpreter's mental overload. Instances of addition can be categorized by explicitation, deverbalization and supplementation.

Key words: Chinese into English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omissions; additions; ear voice span (EVS)